

科技与社会

# 中西科学社团的交流(1949-1982)

以中国生物化学(委员)会为例

熊卫民

**摘要** 在大量档案、回忆录和访谈的基础上,本文详细地再现了1949-1979年间中国生物化学(委员)会参与国际科学交流历程:1956年,经周恩来总理关心,加入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IUB);1958年后,因IUB没有完全拒绝台湾的入会申请,先是以不参加国际生化大会以示抗议,后来又申明退出;1979年,在西方科学家的大力斡旋下,大陆以国家会员名义、台湾以地区名义重新加入IUB,开创了海峡两岸同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加入国际学术组织的新模式。文章还由小见大,展示了不同时间段大陆和台湾的两岸政策,分析了其得与失。

**关键词** 科学社团 交流 台湾问题 奥运模式 IUB

科学没有国界,它的发展有赖于国际交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却逐步减少并一度基本断绝了与西方科学界的联系,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后,这种联系才开始重建,并于1979-1982年取得重大突破。当时,有哪些国际、国内因素影响了中外科技联系?为维持和重建中外科技联系,中外的科学家各自作了哪些努力,与行政官员有哪些互动,在打破僵局方面各自起了哪些作用?对中国生物化学(委员)会与西方相关社团的交往进行案例研究,探清其与西方科学社团交往的过程,分析相关的影响因素和得失,不但有助于解决上述疑问,还对理解1949-1976年间中国科学发展的独特道路有重要意义。

## 一 成立中国生物化学委员会,参与国际交流

### 1. 国际科学界多次邀请中国生物化学家参与国际交流

作者简介 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1949年和1952年,先后在英国剑桥和法国巴黎召开了两次国际生物化学会议。为了使会议制度化,促进生物化学的研究和教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1953年3月,相关科学家开始筹备成立国际生物化学协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Biochemistry,缩写为IUB)。1955年3月1日,该会在英国伦敦正式成立。此前,已决定于1955年8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第三届国际生物化学大会。

1954年12月1日,第三届国际生物化学大会组委会的李也贝克(C. Liébecq)教授发请柬给中国科学院,邀请其派代表参加此次会议。鉴于公函未获回音,1955年2月,大会组委会委托对华一贯友好、与中国科学界有密切联系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直接致信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请他派代表参加该会。大概由于当时国内“反胡风”运动正酣,郭沫若也没有及时回复此信。

1955年5月30日,第三届国际生物化学大会组委会正、副主席直接致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请求他运用自己的“巨大的影响”,“使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化学家的代表团参加将于1955年8月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生物化学大会。”[中科院1956a]

国外科学家三番五次地热情邀请中国科学家参加会议,有其特殊时代背景。1949年后,苏联和美国开始核军备竞赛,苏联更于1953年研发出了可在战场上实用、能将最大的城市夷为平地的“干式”氢弹,而美国也于次年制造出了类似武器;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公约组织在多个地方激烈对抗。为打败法西斯而研发原子弹的科学大师们发现,他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在当时那种强烈的猜疑、恐惧和敌对宣传盛行的气氛中,看来冷战很有可能变成热战,文明即将毁灭”[罗特布拉特1994,页92-96]。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制止相互毁灭,1955年,一批著名科学家站出来先后签署了《哥廷根宣言》、《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和《迈瑙宣言》等反战宣言,而《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更是引发了一直持续至今的科学家国际和平运动——帕格沃什(Pugwash)运动。他们认为,冷战双方的科学家,克服意识形态的阻碍,聚到一起来开会,相互达成谅解,对于消除对抗、化解危险,具有重要意义。正是为了“在贵国科学家和西方科学家之间建立密切联系,增加相互了解的机会”,负责第三届国际生物化学大会组织工作的布拉彻特(J. Brachet)教授等人才给“竭力提倡不同人民和不同经济、政治制度和平共处的”周恩来总理去信[中科院1956a]。

1955年7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简称“指委会”)及外交部的意见,中国科学院向李也贝克和中国驻苏大使馆分别去电询问第三届国

际生化大会是否邀请了台湾代表。获悉该会“无蒋匪代表参加”后，郭沫若于7月20日给李约瑟复信，告知中国科学院将组织代表团赴比利时，参加国际生化大会。而周恩来也给大会组委会回了信。

## 2. 第三届国际生化大会

中国科学院决定派遣以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汪猷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大会。生理生化研究所副所长王应睐于同时被确定为第二个代表。但第三个代表的人选，却出现了一点曲折：最初想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化学系主任林国镐，后来又临时换成了北京医学院副院长薛公绰。此外，翻译齐宗华也参加代表团。时间原本紧迫，再加上临时换将，使得代表团的行动十分仓促。稍后，汪猷等如此总结他们的会前筹备经过：

汪王二同志在七月十六日方接到通知，限于十八日以前由上海到京，薛同志则得知更迟。而大会会期在八月一日至六日。因此一切准备都感仓促……汪王二同志能在二十五日由北京起飞廿六日到莫斯科，薛同志能在廿九日到苏联首都，齐同志亦能于廿六日自维也纳赶到莫斯科。由于等候护照上比利时使馆的签证，及中途等候飞机直至八月一日方离莫斯科，至二日晚到比京百色，三日方克向大会报到并出席会议，因此由于迟到二日，失去了大会初期活动的机会。[汪猷等 1955]

到会后，汪猷报告了《金霉素抗生作用的机构(1)：对于大肠杆菌呼吸的影响》，王应睐报告了《琥珀酸脱氢酶的研究I：分离纯化和特性》，均颇受关注。但由于主要以国家代表而非独立个人的身份参加，六天的会议，第三天才出席，且会前缺乏准备，他们在学术上的收获自然有限。但“交流学术经验”原本就只是中国代表团的次要目标，根据会议计划，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宣传我国科学与和平建设的成就和我国人民愿意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愿望”[中科院 1955]。在后一方面，他们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不仅根据会前官方规定的口径向感兴趣的代表，尤其是美籍华人学者金祖怡等解释了思想改造政策等，汪猷还在代表团团长的宴会中发表简短演说，“特别强调了各国科学家经常接触和消除隔阂的重要性，使与会代表明确地了解了我国参加大会的精神。他的话得到参与宴会的各国代表的热烈同情”[王应睐、汪猷 1955]。

中国代表团一个更重要的收获是，获得了加入 IUB 的邀请。8月3日晚，在苏联大使馆招待会上，协会秘书长英国人汤姆逊(R. H. S. Thompson)和协会司库、

美国人施托茨 (E. H. Stotz) 向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入会邀请。汪猷等当即表示愿意加入, 并且希望以大国的资格加入。经苏联科学院的奥巴林院士、恩格尔哈德院士出面斡旋, 5 日, 委员会同意了中国的请求, 要求中国迅速成立五至十人构成的委员会, 向 IUB 提出以大国资格申请入会, 并指定二人为 IUB 委员会的委员。

能够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科学家代表之一, 赴西方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汪猷、王应睐等人是幸运的。如果不是在对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业已基本完成, 对外的“朝鲜战争”业已签署停火协议, 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向科学进军”和进行对外交流的背景下, 并得到总理的关心, 他们恐怕是难以际会这种因缘的。

### 3. 组建中国生物化学委员会, 加入 IUB

回国之后, 王应睐等撰写了详尽的《关于参加第三届国际生化大会的报告》, 建议“科学院即与有关部门协商组成一个五至十人的中国生物化学委员会, 并将此委员会名单寄交 IUB 会长, 同时申请以大国 (两个委员) 的身份参加协会”。中国科学院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决定成立由五人构成的中国生物化学委员会, 并迅速致函有关单位, 对拟遴选的委员进行政治审查。

几年前, 中国就已经成立过中国生物化学会。中国的生物化学研究从 1920 年代起步, 曾取得过蛋白质变性理论的提出等杰出成就, 主要学术带头人吴宪等在国际上享有相当高的声誉。1949 年 10 月, 经过两年多的筹备, 林国镐、郑集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生物化学会, 林国镐、万昕、郑集、刘思职、林树模、兰天鹤、李维镛等七人当选为理事, 由林国镐任理事长, 当时共有会员 36 人。1950 年, 它被并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 停止独立活动 [郑集 1989, 页 180-182]。

经所在单位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一再政审, 中国科学院于 1956 年 2 月基本确定了中国生物化学委员会的名单: 王应睐、汪猷、林国镐、殷宏章和杨恩孚, 以王应睐为主席。不久, 指委会的赵毅敏副主任, 国务院的陈毅副总理、习仲勋副

---

在协会的委员会中有两个代表, 会费也较只有一个代表的小国多一倍。

吴宪 (1893-1959), 生物化学家和营养学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8)。1912 年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赴美留学, 1919 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 年回国, 1924 年起主持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在随后的十多年里, 他在临床化学、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以及营养学等领域提出了许多创见, 并培养出了包括刘思职、陈同度、杨恩孚在内的大量人才。他于 1947 年离开中国, 先后在美国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任客座教授等。

总理先后圈准了中国科学院的报告,1956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同意。希照办。”决定将此委员会的名单寄交 IUB 主席,申请以大国(两个委员)的身份参加该协会[中科院 1956b]。同年,IUB 批准了申请,中国科学院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加入 IUB [Slater and Whelan 1980, pp. iii-v]。

然而,并非所有科学学会都像生化委员会这么幸运。与中国科学院获准加入 IUB 基本同时,指委会否决了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 缩写为 ICSU)对中国科学院的入会邀请,以及国际数学联合会(IMU)对华罗庚领导的中国数学会的入会邀请。原因相同,都是因为那些组织接纳有“台湾匪帮”的代表。所以中国科学院院长向 ICSU 提出,只有“在台湾组织被驱逐之后”,“我们”才愿意“应邀参加国际科学协会”[中科院 1956c]。

## 二 反对台湾入会,退出 IUB

### 1. 台湾申请加入 IUB

ICSU、IMU 等并没有同意郭沫若等人的要求,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代表驱逐出去。而且台湾还开始申请加入新的国际科学学会,积极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

1958年8月22日,IUB 收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全汉昇的电报,声称他们业已组织了一个中华民国生化全国委员会,请求参加 IUB。8月24日,IUB 秘书长汤姆逊发出回信,告知申请书将于9月1日在 IUB 事务局的会议上提出。9月29日,他又将 IUB 会章一份寄交全汉昇,并要求其提供生化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名单。收到此项名单以后,IUB 秘书长又于1958年12月3日,依照会章将第二条(3)的规定向 IUB 的全部成员发出通函,征询各该有关国家是否赞成这一生化全国委员会的组成,并说明如果在1959年3月1日以前不获答复即作为赞成的表示。

在北京,经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批示,1959年1月,中国生物化学委员会主席王应睐给 IUB 去信,抗议将接纳台湾的问题纳入 IUB 的会议议程。其他国家也相继反馈意见。据3月1日后的统计,IUB 共从8个国家接到复函,其中4个同意,3国反对,其他1国声称对于台北的生化全国委员会虽不提出反对,但中国代表的问题应提交下届全体大会讨论。换句话说,除了中国、苏联等四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此有异议外,其他会员国都赞同接纳台湾。基于这样的投票结果,汤姆逊向王应睐复信表示,不能拒绝台湾善意的申请。经

对外文委批示,王应睐又于1959年9月21日向IUB去信,表示中国代表决定拒绝参加该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四届国际生化大会和IUB第三次代表大会,以作为对正在进行的“两个中国”阴谋的抗议。IUB对此未作回复[中科院1961]。

鉴于有3个国家复函明确反对接纳台北中央研究院,IUB事务局在讨论后决定,由IUB秘书长致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由北京中国科学院代表,但是,鉴于这种代表实际不包括台湾的生物化学家,事务局可以考虑接纳台湾中央研究院,如果其申请只是关系到台湾,而不包括中国大陆在内。1961年1月12日,IUB收到台湾来的复函。函中声称,尽管IUB秘书长已经指出一个国家由两个不同的全国委员会来代表为不可能,台湾新近成立的全国委员会仍不准备仅仅代表台湾,而想代表全国来行动。IUB决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继续讨论台湾的入会问题[中科院1961]。

此时,台湾的生化研究力量并不强大,因为,第一,老一辈有成就的生物化学家,大多留在了大陆,少数去了国外,随国民政府迁台的只有李先闻等极少数学者;1940年代派出的留学生,一部分回了中国大陆,一部分留到了国外,去台湾的风毛麟角;1950年代后在台湾本土培养的人才,还基本没有露出头角。第二,台湾当局把“反攻大陆”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对包括生物化学在内的基础科学研究重视得很不够——直到1970年,他们才在中央研究院成立生物化学研究所。他们之所以在很少有人知道IUB的存在的情况下,申请成为其会员,并有意将大陆的中国科学院排挤出去,与美国在后面为其出谋划策不无关系。

## 2. 第五届国际生化大会

第五届国际生物化学大会及IUB第四次代表大会将于1961年8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这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生物化学会议,深得苏联重视。1958年10月,第五届国际生化大会秘书长、苏联科学院生生物学部秘书西萨江院士曾向来莫斯科协商中苏科学院蛋白质合作研究的王应睐和曹天钦说明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希望届时中国能派百人以上的代表团参加。1960年9月,他再次来信,征求中国对参加这次大会的意见。尽管此时中苏关系已经走向分裂,经国家科委和对外文委批准,中国科学院还是决定派人参加。

1961年6月,王应睐收到IUB秘书长汤姆逊寄来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议程,

---

据台湾生化界的代表人物苏仲卿教授回忆,直到1961年他才知道IUB的存在,而中央研究院申请加入IUB,是出于美国国家科学院外事秘书Harrison Brown的邀请。见苏仲卿2006。

发现仍有讨论接纳台湾入会问题的议程。7月11日,中国科学院将此议程上报国家科委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简称“外办”),提出以拒绝出席会议的方式进行抗议。随即,他们以王应睐的名义,给IUB秘书长汤姆逊发出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并将其抄送给苏联的大会组委会。其主要内容如下:

世界上只有一个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IUB违反自己的会章,在1956年接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生化委员会为成员以后,又要接纳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所谓生化委员会的申请,这是干涉我国内部事务、附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这样做的结果,IUB必将失掉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生化学家们的支持,并遭到世界上正直的科学家的反对。

敬爱的教授,希望你正确的理解以上情况,并作出正确的抉择。在未从议程中撤销讨论接纳台湾问题之前,我们不能考虑参加会议的问题。

我再一次重申,协会如接纳了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生化委员会则坚决退出IUB。[中科院1961]

1961年7月20日,经国家科委合作局、外交部国际司及中国科学院国际联络局共同研究,中国科学院又向国家科委提出,仍派人出席会议,以便正面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作斗争。7月31日,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具体的出席会议计划,决定派王应睐、殷宏章、沈善炯、邹承鲁、曹天钦等五人出席会议,由王应睐任团长。临行前,对外文委、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召集代表团开会,一再要求他们“胜利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政治斗争和摄取这次大会的学术油水”。[中科院1961]8月7日,代表团到达苏联。为了更有效地开展政治斗争,驻苏大使馆科技组的张运恒、彭露兮和何燕生也参加代表团。

会议于8月10日正式开幕,共进行了6天,有来自58个国家的约5000名科学家到会。除报告5篇论文外,中国代表团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幕后的政治斗争上。

8月8日、9日,他们分别找大会组委会的西萨江院士、奥巴林院士和恩格尔哈德院士谈话,希望组委会向IUB提出,撤销讨论台湾入会的议程。苏方称,自己仅为大会的东道主,IUB的一切活动和决议,均无法由自己单方决定。但在代表团力陈利害,指出“接纳台湾入会的问题如在莫斯科讨论,不仅对中国是莫大侮辱,对苏方及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莫大侮辱与难堪”后,他们同意和IUB的负责人商谈。果然,9日晚上,他们与IUB主席弗罗尔金(M. Florin,比利时人)

秘书长汤姆逊(英国人)商议了此事。10日,弗罗尔金在开幕大会中找到王应睐,告知他们打算“另搞一个议程,不列入台湾申请入会问题,若有人提出质问,将由主席说明台湾申请问题复杂,尚不能构成讨论案”。王当即提出,最好由主席开头便做



图1. 1961年8月,中国科学院派代表参加第五届国际生化大会。  
左起:曹天钦、沈善炯、王应睐、殷宏章、邹承鲁。(沈善炯院士提供)

出明确声明,说台湾的申请问题现在和将来都不能讨论。经与组委会苏方主持人商量,弗罗尔金表示,他们不能这么做,因为情况有变化——最近(1961年6月初)台湾来信声明可同意暂时代表台湾[中科院1961]。

8月11日、12日,根据外交部、对外文委和国家科委的电话指示,代表团继续找组委会、IUB的负责人商谈。8月13日,苏联科学院人民民主国家处处长普拉索洛夫通知代表团,在12日晚召开的理事会邀请了美国出席IUB第四届代表大会的二位代表参加。理事会决定重新编制议程,将台湾申请入会的问题取消,美国代表也同意在代表大会上不提出此问题。因此,苏方要求中国代表也不要就此问题发言。

14日晚举行IUB第四次代表大会,议程中讨论台湾申请入会的项目果然被取消了。但在会议结束前几分钟,美国代表提出质问:为何台湾申请入会原定议程未提出讨论?大会主席弗罗尔金说:台湾1958年提出申请,但声明它不仅代表台湾亦代表全中国,最近又来函表示同意暂时只代表台湾,此问题很复杂,不便进行讨论;同时协会尚缺乏表决制度,无法进行讨论。美代表当即建议协会应制定表决制度。会议到此结束,没有给刚当选为IUB理事的王应睐以表态的机会。

第五届国际生化大会于8月16日下午举行闭幕式。此前,中国代表团已准备了一个书面的申明,对大会从原定议程中取消讨论台湾申请入会问题表示满意,并反驳了美国代表的建议。但大会组委会不同意散发此文件。他们只好查明代表的住址,自行分送各处;有一部分代表已离苏返国,即通过邮局寄去。

回国之后,代表团向有关方面提交了详尽的《中国科学院出席第五届国际生化会议代表团总结报告》。报告认为:“苏联既不愿得罪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也不敢得罪我们”……尽管他们“在这次斗争中总算对我们作了支持(争取台湾申请入会问题不列入议程),但由于他们基本上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并不准备通过这次会议彻底解决美帝在这个学术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问题,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向西方国家作了妥协,以求得在莫斯科开会期间不发生任何所谓‘不愉快’事件而顺利渡过。”[中科院1961]

### 3. 退出IUB

代表团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尽管在东道主苏联三心二意的支持下,他们如愿以偿地阻止了IUB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台湾申请入会问题,但美国代表在最后几分钟的发言,仍给台湾在未来的入会制造了转机。

在莫斯科会议后,IUB的主席换成了美国人欧卓阿(S. Ochoa),秘书长和司库未变,仍分别为英国人汤姆逊、美国人施托茨。协会根据美国代表的建议,制定了入会申请的表决制度:如果在通信投票(postal ballot)阶段,无会员投反对票,可直接以“无异议”方式入会,如果有反对票,则在IUB的代表大会上投票表决,只要有多数票通过即可入会。

关于暂时只代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的入会问题,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共产主义国家会员的反对,当然不得以“无异议”方式入会,但是,由于反对者只是少数,1964年7月,在美国纽约召开的IUB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它必然会得以通过。结果正是如此,台湾代表苏仲卿曾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形:

我的任务是先在会员大会场的外面,等候大会表决结果,假如通过,就进入会场,致感谢大家支持的言辞,并参与接下来的会程……该次会员大会中对中研院入会的票决,是明确的共产圈与非共产圈的对立,当然美国主导的案件获得绝大多数的支持通过。[苏仲卿2006]

对这样的结果,中国大陆和IUB的负责人当然早就是预料到了。所以,1964年1月14日,在获得通信投票结果后致王应睐的信中,IUB秘书长汤姆逊直截了当地说:“现在宣布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已当选为本协会会员,并将投票结果在1964年7月在纽约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正式汇报”[中科院1967]。在向有关方面请示后,1964年5月12日,王应睐再次致信汤姆逊,不仅提出抗议,还声明将与IUB断绝一切关系。事实上,从1962年起,中国科学院就没再向IUB缴纳过会费。

1964年11月23日,不久前上任的IUB主席、诺贝尔奖得主欧卓阿代替不

久前卸任的 IUB 秘书长汤姆逊给王应睐回了一封信。在介绍完投票经过和他们不得不根据规则接纳台湾中央研究院后,他陈述了 IUB 的立场,并试图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生化委员会不要和 IUB 断绝联系:

我必须强调 IUB 的工作必须专门以学术上的考虑来指导,还要强调:至少只要是由我作会长,协会就要努力不干涉任何民族、国家或领土的内政。IUB 力图协助和培育生物化学在全世界各地发展,而且它的行动应当专门是由帮助从事于生物化学的事业的任何或大或小的一组人员的愿望而得到促进。

我还要说,我个人和 IUB 的整个理事会都非常高度地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们协会里的会籍,而且,如果任何除了严格的学术上的考虑以外的考虑剥夺了 IUB 的主要会员之一的話,那将是极端遗憾的事情。因此我想大力地劝说你们的全国委员会不要和协会断绝联系。[中科院 1967]

跟以往一样,王应睐将此信提交给有关部门。不久,他得到了一封由中国科学院草拟,国务院外办修订过的措辞更为强硬的回信。1965年3月18日,他在这封经周恩来、陈毅亲自审定的信上签署自己的名字,以电报的方式发给欧卓阿。1965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

……电报说,我们曾多次向国际生物化学协会理事会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它既不是什么“国家”,也不是协会会章第二项第四条中所说的“附属国”,接纳台湾蒋介石集团为会员是对我国内政的干涉,也是违背协会会章的。但是,协会理事会却不顾我们的强烈反对,坚持把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入会申请交付投票表决,而且在第一次邮寄投票表决没有获得通过以后,又将其列入 IUB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只是由于我们坚决抗议,才被迫撤销,最后,又施展诡计,修改会章中接纳会员的规定,硬把台湾蒋介石集团塞进国际生物化学协会。这就充分暴露了协会理事会少数领导人为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效劳的面目。所谓国际生物化学协会的工作专门以学术上的考虑为指导和不干涉任何民族、国家或领土的内政,完全是虚伪的。现在事实俱在,不管你们以什么借口作掩护都蒙蔽不了全世界一切正直的生物化学工作者的耳目。

电报说,由于国际生物化学协会理事会接纳蒋介石集团的错误行动,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严重破坏了协会同我们的关系,我现在代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全国生物化学委员会正式宣布退出国际生物化学协会，并断绝同它的一切联系。国际生物化学协会理事会应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这封电报已抄给国际生物化学协会各会员国。[新华社 1965]

#### 4. IUB试图挽留中国科学院

IUB 执行局在接到王应睐的电报以后，试图采取多种举措继续挽留中国大陆的会籍。1965年12月27日，欧卓阿再次致信王应睐，告诉他，IUB最近修改了会章，新会章中关于会籍的条文有了“不同的根本性的”改变——在新规定中，团体会员不再代表国家而代表科学团体，后者“适用于一个国家的生化工作者或有独立科学预算的某一地区的生化工作者”。他认为，这个改变将排除中国大陆退出 IUB 会籍的各种理由，希望中国大陆重新考虑退出 IUB 的决定。他还建议 IUB 会章委员会主席、英国科学家杨格 (F. G. Young) 教授于 1966 年 4 月趁去香港之便顺访中国大陆，并就中国大陆退出 IUB 事，与中国科学院进行协商。[中科院 1967]

1966年1月19日，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达尔文学学院院长杨格教授也致信王应睐，称自己对香港大学的访问将于4月2日结束，假如中国科学院“可以作出所需要的安排，我将非常高兴去和你同你的同事们讨论 IUB 所提出的新的会章以及新的会章对于过去曾经引起的困难的一系列问题的含义……我将情愿而且乐于进行任何的讨论，如果这种讨论可能对于你们的生物化学全国委员会进一步考虑提出退出 IUB 的各种理由的方面提供一个即使是极为微弱的可能的话。”[中科院 1967]

对于这两封信，中国科学院外事局给出的应对意见是：“考虑到，IUB 会章虽有改变，但仍没有把蒋帮分子的会籍取消，而是把会章中关于‘国家’的规定改为‘地区’。对此，我们目前不宜予以纠缠。今年九月间，拟在我国召开的关于胰岛素合成国际会议，可能邀请杨格参加。故拟以王应睐所长名义复一信，暂时拖一下。”[中科院 1967]

1966年2月初，王应睐给杨格复了一封不冷不热、非常简单的信，声称自己“本来会极为高兴地和你再一次会面，如果不是我有一封来自波兰的请柬并且已经应许参加在华沙举行的欧洲生物化学学会联合会的会议，而且我要在欧洲停留几个星期的话。”[中科院 1967]

2月28日,杨格再次致信王应睐:“我注意到,由于在华沙举行的会议,你将在东欧停留几周。你在欧洲停留期间,若有机会访问剑桥大学,我将乐于再次与你相见。”[中科院1967]作为科学家的王应睐本人,或许会为杨格教授的热情所感动,但在与协会相关的问题上,他只能服从官方的意见,完全身不由己,最终未能在1966年访问母校剑桥大学。

1966年底,IUB秘书长德斯努艾尔(P. Desnuelle)致函王应睐,希望他对将于1967年8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七届国际生化大会的日程提出建议,并提供中国出席第七届大会的代表名单。此时,“文化大革命”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王应睐只能根据中国科学院外事局的指示,对来函“不予理睬”。

1967年初,第七届国际生化大会的组织者富永振一郎、赤崛四郎给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寄去30份大会通告和1份邀请信。在通告中,王应睐的名字被列入IUB的理事名单中。“为了防止在大会的有关文件和资料中继续出现‘两个中国’问题”,“重申我坚决反对美帝阴谋制造‘两个中国’的严正立场”,中国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以王应睐的名义写了一封信,“再一次抗议”“私自”把王应睐的名字列入理事名单,并要求对方“保证不再在各项文件及其他场合发生类似性质的错误”。经对外文委批准,这封信于1967年2月被发给富永振一郎和赤崛四郎[中科院1968]。

就在1967年的东京会议上,杨格教授等人将关于“国家”的规定改为“地区”的会章修改建议被正式通过[Slater 2000, pp. 331-337]。次年,日本学术会议事務局将包含会议文摘、参加者名单等在内的会议材料10本邮寄给王应睐。因里面台湾代表郭宗德、苏仲卿、董大成的国籍被写为“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经请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其退回,并以王应睐的名义发出一封表示“极大的愤慨”、“再次向你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的信[中科院1968]。

尽管屡次遭到中国方面的抗议和拒绝,IUB一直试图保持与中国大陆科学家的联系。譬如,杨格、汤姆逊曾于1971年4月1日致函中国驻英代办处,邀请王应睐参加当年9月15-17日在英南安普顿大学举行的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第七届年会,并做学术报告。虽然相关公文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市革委会、外交部、国务院等机构反复旅行近5个月,到9月初遭到最终的否决,这次邀请仍对上马胰岛素的结构与功能研究项目、改善王应睐等人在文革中的艰难处境起了一定的作用[熊卫民2009,页207-216]。

### 三 重新加入 IUB，提供示范模式

#### 1. 联合国模式

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给深陷在“文化大革命”泥潭中的中国带来转机。从“批林整风”到邓小平复出，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1972年9月29日中日恢复邦交，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开始发生变化。

随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的增多，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席位，将“中华民国”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从此，中国大陆的外交空间大幅增大，而与政治关系较远的科学界和体育一样，也成了国家对外开放的先头兵。除了接受一些外国学者，尤其是美籍华人科学家访华，并派出少量科学家代表团出国访问外，中国还开始谋求出国参加学术会议，进入或重新进入国际科学组织。

当时，中国大陆的对外学术交流，遇到的首要障碍，与五、六十年代一样，还是台湾问题。正如1972年8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周培源在接见英国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霍奇金(Dorothy Hodgkin)时所言：任何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如有台湾参加，我们坚决不参加。

在这种指导思想的作用下，台湾尚未参加的国际会议、国际组织还好说，那些台湾已经参加了的，中国大陆要进入，就意味着必须采取加入联合国时用过的的方式，将台湾代表驱逐出去。而这，正是中国大陆的一些科学社团所努力的方向。

1976年8月19日，经中国大陆大量的幕后工作，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取消“中华民国”作为这一组织成员的资格、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该组织正式成员——与许多国际组织以地区为会员不同，IUGS系以国家为会员。8月22日，以地质部副部长许杰为团长的中国地质学会代表团乘飞机到达悉尼，参加了IUGS理事会会议和第二十五届国际地质大会[新华社1976a;新华社1976b]。中国本是国际地质大会的热情参与者，从1906年举行的第十届大会到1948年举行的第十八届大会，中国都曾派代表参加，地质学家翁文灏还曾担任大会的副主席。可由于台湾问题，“自1952年第十九届大会到1972年第二十四届大会的这二十年间，我国虽受到多次邀请……都毅然拒绝派出政府代表团参加大会活动。例如1956年9月在墨西哥召开的第二十届国际地质学大会，我国事先作了充分准备，征集了论文132篇，

组织了代表团,但未赴会。”[夏湘蓉、王根元 1982, 页 199]

1977年8月6日,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排除台湾,接纳中国大陆入会的决议。随即,中国大陆派出以顾功叙为团长的代表团赴英国达勒姆,出席9-19日国际地震学与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和国际火山学与地球内部化学协会联合召开的学术讨论大会。同年,中国科学院报国务院批准成立IUGG中国委员会。1979年12月2日,中国科学院派团赴澳大利亚堪培拉参加IUGG第17届大会,正式恢复会员资格。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这么做难度很大。因为许多科学家都对国际科学社团如此深入地介入政治问题,以至于违背其促进各地区科学发展的初衷表示反对。鉴于此,1976年10月,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第十六届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十六届ICSU全体会议建议,ICSU的所有科学联合会坚持科学普遍性的原则,不排斥任何有效地代表一个限定地区里科学活动的科学团体的会员资格。全体会议渴望、欢迎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科学团体以全国性会员资格参加ICSU及其附属的联合会。会议建议,ICSU所属的科学联合会,准备与科学团体机构建立关系,只要这些科学团体能够有效地代表一个限定地区的科学活动,并能够以不会对所代表的地区产生任何误解的名称进行登记。”[Slater and Whelan 1980, pp. iii-v]也就是说,这项决议不赞同ICSU的下属科学组织,如IUB,采取联合国模式,以牺牲台湾的会员资格为代价来接纳中国大陆的加入。

## 2. 多伦多协定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1979年是个充满新气象的年份。内政和思想方面,就在刚刚过去的1978年12月,召开了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开放、改革的治国方针,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批判了两个“凡是”,把实践而非毛泽东的话确定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外交和两岸关系方面,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美台断交,大陆发布《告台湾人民书》,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新华社1979]。

在新思路的指引下,被“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耽误了十多年的中国大陆的科学家不但试图活跃内部的学术交流,还非常急切地想参加国际会议、加入国际组织、向外国的同行学习,以尽快融入国际科学主流。1979年3月15日,中国生物化学会筹委会主席王应睐给IUB秘书长、美国科学家威伦(W. J.

Whelan) 去了一封信, 提出了重新加入 IUB 的问题。4 月, IUB 司库、荷兰科学家斯雷特 (E. C. Slater) 经中国科学院—荷兰科学院的交换项目应邀访华。在北京完成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讲学的任务后, 在该所研究员、他的剑桥大学念书时的师弟邹承鲁的陪同下, 他来到上海, 与王应睐及中国科学院的官员商谈了中国重新加入 IUB 的问题。

王应睐等告诉斯雷特, 他们将于 5 月下旬在杭州召开第三次全国生化大会, 同时成立中国生物化学会 (Chinese Biochemical Society, 简称 CBS)。拟邀请台湾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 并为他们保留了一名副理事长和一名理事的名额。这个能够同时代表大陆和台湾的学会成立之后, 他们就会正式提出加入 IUB 的申请, 条件是停止台湾的独立会员资格。

斯雷特说, 这是一项有意思、积极的建议。只要台湾同意, 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作为一个代表将是解决问题的很好办法。但是, IUB 的章程不允许驱逐一个团体会员, 除非有严重情况发生。而台湾中央研究院还并未发生过有违章程的严重情况。经过进一步的讨论, 斯雷特提出, 可以由 IUB 执行局召开一次有大陆和台湾代表参加的会议, 来协商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斯雷特、威伦 1980, pp. 45-51]。

威伦向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传达了在中国大陆讨论的结果, 并询问他们是否愿出席上述由 IUB 执行局召开的会议。中央研究院在复信中邀请威伦等人访问台北。

6 月 13~15 日, 威伦和斯雷特到达台北。在这次访问中, 他们意识到, 在当时海峡两岸敌对气氛还比较浓的情况下, 台湾的生化学家不可能有效地参加在杭州成立的中国生物化学会的活动——他们于 1970 年在台北也成立了一个中国生物化学会, 英文名也为 Chinese Biochemical Society。按大陆提出的条件接纳大陆的学会, 实际上会终止台湾生化学家在 IUB 中的代表地位, 至少暂时会如此。据威伦回忆, 在会谈结束、即将飞离台北时, 失望的他突然想起一个台湾同事曾在信纸中把自己的地址署为中国台北 (Taipei, China)。“中国”是海峡两岸都可以接受的! 他马上找来一张黄色的便笺纸, 在上面写到: “在中国的名下暂时将有两个团体会员” [Whelan 2002, pp. 41-42]。他认识到, 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1979 年 5 月 27 日, 中国生物化学会在杭州正式成立。“选举产生了理事会, 由王应睐任理事长, 曹天钦、邹承鲁、梁植权、张龙翔任副理事长, 曹天钦兼秘书长。” [张友尚 2003, 页 323] 他们随即向上级提出要派代表参加 1979 年 7 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生化大会及第十届 IUB 代表大会, 并解

决中国在 IUB 的合法席位问题——IUB 的代表大会三年才召开一次，如果不能在 1979 年解决 CBS 的入会问题，就意味着要多耽误三年时间。

1979 年 6 月下旬，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决定派六名代表赴多伦多开会，由王应睐任团长、邹承鲁任副团长。7 月初，王应睐、邹承鲁、沈善炯、张友尚、杨福愉和梁栋材等六人到中国科学院外事局报到。据邹承鲁回忆，除外事局的干部外，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简称“中央台办”）的负责人也找他们谈过话，主要内容在于加入 IUB 的方略问题。这些行政领导人提出，可以参照国际奥委会前一段提出来的方案，我们用国家的名义入会，台湾用地区的名义留在协会中。

在加入国际奥委会问题上，中国大陆也已和台湾斗争了二十多年。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后，1975 年，中国大陆的奥委会继续申请加入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基于政治不干预体育的奥林匹克原则，要求不得以排除“中华民国”为附带条件。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时，因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主办国加拿大拒绝台湾的奥委会代表团以“中华民国”的名称入境，导致台湾退出国际奥委会。1979 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曾建议台湾的奥委会除去“中华民国”字样，以免蒙特利尔奥运事件重演。稍后，又于 1979 年 4 月在蒙特利尔的第 81 届年会中，通过修正了执委会提案，承认在北京的奥委会为“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Peking”，在台北的奥委会为“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Taipei”，至于双方使用之旗、歌则作进一步研讨。这项决定造成国际奥委会第二次出现两个中国奥委会并存的状况。这就是中央台办负责人所提的奥运方案。

据张友尚回忆，其实他们这些科学家们也早就想到了这种解决方案。“以前，不管是国际会议还是国际组织，只要台湾参加，我们就退出。那是极左的做法。我们是唯一合法的政权，为什么不参加？那么做的实际后果是：合法的不能进去，而不合法的倒进去了。”大陆想参加，而 IUB 又明确表示不能以排除台湾为条件，那么，只有依照 1965 年底 IUB 最早提出、1979 年初国际奥委会曾经建议过的大陆以国家名义入会、台湾以地区名义入会最为务实可行。“虽然我们也想到了，但由于我们没有决策权，所以我们不主动提”，张友尚说。

1979 年 7 月 9-11 日是正式的会期。7 月 8 日，“中国生物化学学会”代表团到达加拿大首都多伦多。王应睐和邹承鲁是中国大陆的主要谈判代表，在威伦和斯雷特的召集下，他们白天参加第十一届国际生化大会，晚上和台湾的谈判代表

据笔者对邹承鲁院士的访谈，2003 年 7 月 19 日。

据笔者对张友尚院士的访谈，2012 年 6 月 6 日。



苏仲卿、罗铜壁洽谈。苏仲卿回忆过当时的情形：

多伦多的会议，我方代表是罗铜壁先生与本人，大陆是生物化学家王应睐、邹承鲁及一位生物物理学家（失念他的大名）等三位，在 IUB 理事会代表同席之下面对面会谈。因为每次会议的结果，双方都必要向本国回报请示，我方是钱【思亮】院长允许本人任何时段都可以打电话给他，但是大陆方面是北京的办公时段才能联络，所以续谈都要等到隔日的午夜以后，进展受到相当大的障碍。[苏仲卿 2005]

在大陆入会、不要求台湾退会的基本共识下，要讨论解决的，其实主要是台湾以何种名称留下来的问题。大陆绝不允许对方使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因中国科学院曾申明退出，大陆此次使用“中国生物化学会”的名义申请入会，它不同意对方再使用“中央研究院”这种不仅具有政治敏感性，且“会对所代表的地区产生任何误解的名称”。台湾也不能直接用自己在 1970 年成立的学会的名字，因为那跟大陆 1979 年成立的学会同名。大陆要求自己以国家的名义入会，台湾以地区的名义入会，也不同意对方关于台湾使用“中国生物化学会，台湾”、大陆使用“中国生物化学会，北京”这种对等名字的建议。最后，经威伦和斯雷特不厌其烦地与大陆和台湾的代表穿梭磋商，终于在 7 月 11 日零点初步达成协议。其具体条文为：

(1) 暂时将有两个团体会员。

(2) 一个将是 1979 年 5 月 28 日在杭州成立的学会，加入 IUB 后，在附则 1 里称为中国生物化学会。另一个是 1970 年台北成立的中国生化学会，在条目 (3) 中称为中国台北生化学会以替代中央研究院（台湾），这样的替代，将在附则 1 中以一个彼此同意的名称表示，根据十六届 ICSU 全体会议的决议，这是一个科学团体的名称，这个团体在一个限定的地区里有效地代表



图 2. 1979 年 7 月，邹承鲁（右前）和威伦（左）洽谈加入 IUB 的事宜。（邹承鲁提供）

独立的科学活动，这个名称不会使人对其所代表的地区产生任何误解。在协议达成之前，这个科学团体在附则 1 条目 (3) 中将称为中国台北生化学会。

(3) 在 IUB 内这两个团体会员的会员资格列在附则 1 内称为：

中国 中国生物化学会

中国台北生化学会 [斯雷特、威

伦 1980, pp. 45-51]

但是, 这个初步协议达成半小时后, 台湾方面又表示有意见。经威伦和斯雷特连夜说服, 方才于凌晨 2: 30 左右重新达成妥协。7 月 11 日白天, 在 IUB 代表大会宣布结束时, 王应睐和邹承鲁走进会场。王应睐上台宣读上述声明, IUB 大会承认大陆入会 [王应睐 1980, 页 1-4]。而台湾代表苏仲卿也得允许上台宣读表明台湾立场的文章 [苏仲卿 2006]。

双方科学家在谈判时有所反复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起决策作用的是他们后面的行政领导: 台湾方面, 苏仲卿、罗铜壁需要请示中央研究院院长钱思亮、ICSU 事务负责人吴大猷, 钱、吴需要请示“外交部”部长兼“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 而蒋彦士又要请示蒋经国; 大陆方面, 王应睐、邹承鲁要请示中国科学院外事局, 中国科学院外事局要请示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还可能要请示中央台湾工作领导小组。双方能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完成讨价还价、基本达成共识, 已经算是极高的效率。

8 月 24-25 日威伦访问北京, 8 月 27 日威伦和斯雷特访问台北, 与海峡两岸的高层继续磋商。困难主要在台湾方面。据吴大猷回忆, 他和钱思亮等主张同意前述方案, 可在钱思亮将该方案提交给“外交部”后, 它却为“行政院外交小组”所否决。原因及以后的处理过程如下:

闻考虑点之一, 乃当时奥林匹克运动会排我, 政府深恐我方在此国际科学组织会籍问题上所采之立场, 将在奥运问题产生不利之影响云。翌晨钱院长于再晤 Whelan 氏时, 托词该方案须俟中研院评议会的通过。本人拒绝面对 Whelan 作谎言, 愤未出席。Whelan 乃离台返美。钱院长乃与行政院孙院长面申会籍问题的迫切形势, 孙院长乃嘱蒋部长邀数位有关人士开一专案座谈会 (八月卅日), 再度研讨此问题。会中阎振兴、王纪五及本人申述我国维持国际科学组织会籍的重要性, 沈家铭谓科学组织大会中无“国旗”、“国歌”等问题, 所讨论的方案, 对奥运无何影响云。会后蒋部长将一切面陈最高当局, 该方案即经核可。翌晨我方即电邀 Whelan 氏再来台。九月二日 Whelan 氏再抵台, 经中研院签订该建议方案后, 即再飞瑞士, 及时将该方案提供 [给] (行将闭幕) 的 IUPAC 大会。 [吴大猷 1988, 页 355-367]

经两岸最高当局认可的最终协议内容如下:

为了解决中国生化工作者在 IUB 中的代表问题达成了以下协定:

- (1) 暂时将有两个团体会员。

(2) 一个是1979年5月28日在杭州成立的中国生物化学会,加入IUB后在附则1中称为中国生物化学会。另一个是1970年在台北成立的中国生化学会,它将替代中央研究院(台湾),在附则1中称为位于中国台北的生化学会。

(3) 在IUB内这两个团体会员资格列在附则1如下:

中国 中国生物化学会

位于中国台北的生化学会 [斯雷特、威伦 1980, pp. 45-51]

1979年11月4日,IUB的新任主席伍德(H. G. Wood) 秘书长威伦和司库斯雷特三人带着IUB关于接纳中国入会的协议书亲自来华,请王应睐等有关人员签名。1980年3月1日,协议正式生效。中国大陆终于得以在退出十余年后重新加入IUB,融入国际生物化学界。

### 3. 成为新的模式

多伦多协定在1979年8月底即得到了ICSU总部的认可。甚至在这之前就已经成为其他国际学会的效法对象。

1979年8月22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UA)的秘书长根据IUB传去的条款,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代表达成了与多伦多协定类似的初步协定。

1979年9月3日,“斯雷特去瑞士达沃斯,向国际理论和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的会长介绍了刚与北京和台北达成的协议,几天后,在这个联合会里达成了基本上相同的协定”[斯雷特、威伦 1980, 页 45-51]。中国化学会的代表胡亚东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参加IUPAC] 临走之前中国科学院外事局找我们谈过话。他们已经跟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有过联系,就中国化学会如何加入该组织交换过意见。外事局要求我们遵照生化学会采用的模式跟联合会谈,说是在这个原则之下怎么谈都行……[到达沃斯后] 我们直接跟联合会的理事会谈,根本就不与台湾代表协商,跟台湾代表之间只是私人接触……遵照相同的模式,我们与联合会理事会之间的洽谈是相当顺利的。

1982年9月13-17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周培源率代表团(成员包括刘东生、唐有祺、曹天钦、胡亚东等)参加了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ICSU第十九届大会。在第二次会议上,他们以与多伦多协定类似的方式,如愿以偿地在ICSU中取代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全国会员资格,而台湾也得以留在ICSU中:中国

---

熊卫民. 中外科学交流的恢复——胡亚东研究员访谈录(待刊).

大陆以 China: CAST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列名, 而台湾以 China: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located in Taipei 列名。这对大陆、台湾的对外科学技术交流而言, 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因为 ICSU 有很多国际科学组织作为会员, 虽然这些组织各有其独立的章程, 并不完全隶属于 ICSU, 但在不少问题上, 仍会以 ICSU 的政策作为指导, 而如何处理大陆、台湾的会籍问题, 就是其中之一。

1984 年 8 月, 在巴黎举行的第 25 届国际地理联合会 (IGU) 代表大会修改了有关章程, 将会员国必须设立国家委员会改为“对应 IGU 委员会 (Committee for IGU)”。不久, 即通过与多伦多协定类似的文件, 在保留台湾地区性会员资格的同时, 恢复了中国地理学会的会籍 [吴传钧 2010]。

1984 年 10 月 8-11 日, 以中国物理学会副会长周光召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了在意大利里雅斯特 (Trieste) 举行的国际纯粹和应用物理学联合会 (IUPAP) 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 接纳中国物理学会为会员 (四票表决权)。与此同时, 中国台北物理学会保留席位 (一票表决权)。” [赵凯华 1985, 页 134]

多伦多会议之后不久, 确切地说是 1979 年 10 月, 国际奥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开会, 决定接纳中国大陆入会, 承认其奥委会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1981 年 3 月 23 日, 在瑞士洛桑召开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 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重返国际奥委会, 英文名被定为 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在名古屋和洛桑分别达成的这两个协议奠定了日后海峡两岸一个以国家名义、一个以地区名义共同参加奥运会的方式。尽管这两个奥运协议比内容相近的多伦多学术协定达成得稍晚, 但由于奥运会在社会上知名度更高, 后来, 相关的模式被称为“奥运模式”。

由威伦、斯雷特、王应睐、邹承鲁、苏仲卿、罗铜壁等人夙兴夜寐、不辞劳苦而达成的多伦多协定是双赢性质的, 它不仅给海峡两岸的科学界同行越过政治障碍一道参加国际会议、交流学术问题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还给体育、经济、卫生、文化等其他领域处理两岸关系提供了示范, 对于扩大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 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 具有深远的意义。

## 四 结语

由中国生物化学(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与西方科学社团交往的历程可以看出, 1949-1978 年间, 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科学交流的, 有包括冷战、中美关系、

中苏关系在内的诸多因素,而台湾问题尤其构成巨大的阻碍。一般而言,中外科学家倾向于积极主动寻求中国大陆与国际科学界交往的可能性,但主管外交、对台事务的中国大陆政府部门则更注重避免任何可能引起“两个中国”的政治问题,结果是大陆科学界自行退出众多国际舞台,进而严重阻碍了科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台湾当局也有排斥大陆的思想。1949-1971年间大陆科学界在国际舞台的退却,给台湾腾出了较多的发展空间。而1972年后大陆科学界再次向国际舞台进发,又令台湾的发展空间日渐萎缩。直到1979年后,台湾才开始真正面对现实,从而导致多伦多双赢协定的诞生。

同样,文革结束之后,尤其是1978-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政府领导人克服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变得柔性、务实起来。在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和体育交流方面,在给台湾机会的同时,也给自己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化解冷战造成的危机、保持科学的国际性、打破海峡两岸的零和僵局、消除大陆和台湾的敌对心理方面,国际科学界起了积极主动的作用。尤其是威伦、斯雷特等人与两岸的科学家一起努力,不辞劳苦地来回奔波,为达成多伦多协议并使其成为两岸之间、两岸与国际科学界交流的主要模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致谢 邹承鲁院士生前启发了我关注中西科学交流选题,张友尚院士、胡亚东研究员接受了我的访问,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文书档案处潘亚男、王兰在资料查找方面给我提供了帮助,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李约瑟研究所给我提供了办公场所和丰富的网络学术资源,沈善炯院士、薛攀皋高级工程师、程光胜研究员、秦正葳女士给我提供了资料,王作跃教授、张九辰研究员阅读了论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 参考文献

- 罗特布拉特 1994. 普格沃什运动的缘起与现状. 载王德禄、刘戟锋主编.《科学与和平》.台北:凡异出版社.
- Slater, E. C. and W. F. Whelan. 1980. China to Rejoin the IUB. *Trends in Biochemical Sciences*. 5.
- Slater, E. C. 2000. International Congresses of Biochemistry—Personal Recollections. *IUBMB Life*. 49.
- 斯雷特、威伦 1980. 中国重新加入国际生化联合会. 袁士龙译.《生化通讯》.(2).

- 苏仲卿 2005. 学术界的“一中各自表述”. <http://www.mbc.ntu.edu.tw/history/one%20China.pdf>
- 苏仲卿 2006. 中研院的国际科学活动与我. [www.mbc.ntu.edu.tw/history/world.pdf](http://www.mbc.ntu.edu.tw/history/world.pdf)
- 王应睐、汪猷 1955. 参加第三届国际生物化学家大会的观感.《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5日.
- 王应睐 1980. 我国重新加入国际生化联合会.《生化通讯》.(1).
- 汪猷等 1955. 关于参加第三届国际生化大会的报告.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 1955-2-91 卷.
- Whelan, W. F. 2002. China and the IUB(MB). *CSBMCB/SCBBMC Bulletin*.
- 吴传钧 2010. 我和 IGU (国际地理联合会). 见吴传钧、施雅风主编.《中国地理学 90 年发展回忆录》. 学苑出版社.
- 吴大猷 1988. 我国在 ICSU 的会籍问题. 见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秘书组编印.《中央研究院史初稿》.
- 郑集 1989.《中国早期生物化学发展史 (1917-1949)》. 江苏: 南京大学出版社.
- 中科院 195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化学代表团出席第三届国际生物化学大会计划(草案).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 1955-2-91 卷.
- 中科院 1956a. 第三届国际生物化学大会组委会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 1956-4-50 卷.
- 中科院 1956b.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 1956-4-50 卷.
- 中科院 1956c. 1956年6月9日郭沫若给国科联理事、苏联科学院院士埃更里加尔特的复函.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 1956-1-42 卷.
- 中科院 1961.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 1961-04-031 卷.
- 中科院 1967.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 1967-4-10 卷.
- 中科院 1968.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 1968-4-15 卷.
- 夏湘蓉、王根元 1982.《中国地质学会史》. 北京: 地质出版社.
- 新华社 1965. 抗议国际生物化学协会少数领导追随美帝制造“两个中国”阴谋 我生物化学委员会宣布退出国际生物化学协会.《人民日报》. 1965年3月20日.
- 新华社 1976a.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通过决议 接纳我国为正式成员.《人民日报》. 1976年8月23日.
- 新华社 1976b. 我地质学会代表团出席国际地质大会.《人民日报》. 1976年8月31日.
- 新华社 1979.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告台湾同胞书.《人民日报》. 1979年1月1日.
- 熊卫民 2009. 访谈朱尚权. 载熊卫民等.《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 湖南: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张友尚 2003. 1979年中国生物化学学会成立记事.《生命的化学》.(4).
- 赵凯华 1985. 国际纯粹和应用物理学联合会 (IUPAP) 接纳中国物理学会为会员.《物理》.(3).

##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Science

The Case of Biochemistry, 1949-1982

XIONG Weimin

**Abstract** :Based on archival research, published memoirs, a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Biochemical Committee/Socie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Biochemistry

(IUB) during the Cold War: It initially joined the IUB in 1956 under the personal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Premier Zhou Enlai, but withdrew from it in 1965, because of its admission of Taiwan for membership that yea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unity improved following the Chinese entry in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1971 and especially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76. In 1979, an agreement was reached in Toronto that allowed mainland "Chinese Biochemical Society" to rejoin the IUB as a national member and Taiwan's "Chinese Bio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to remain in the IUB as a regional member. This so-called Toronto model, which itself benefited from the Olympic model which admitted mainland China but allowed Taiwan to remain as "Chinese Taipei," became the basis for scientist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o attend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s or joi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in most other area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Communication, Olympic Model, Taiwan Problem, International Union of Biochemistry.